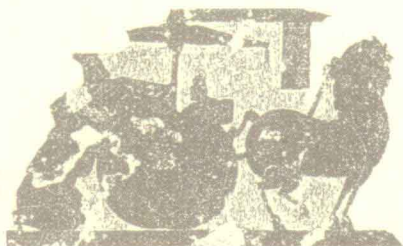


汉代孝子图与孝道观念

黄婉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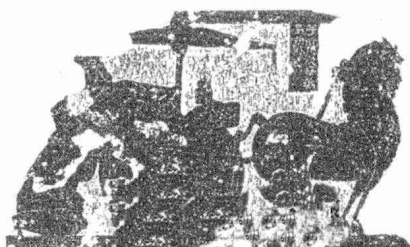


HANDAI XIAOZITU YU XIAODAO GUANNIAN



汉代孝子图与孝道观念

黄婉峰◎著



HANDAI XIAOZITU YU XIAODAO GUANNIAN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孝子图与孝道观念/黄婉峰著.—北京:中华书局, 2012.8

ISBN 978-7-101-08469-6

I. 汉… II. 黄… III. 孝-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汉代 IV. 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6865 号

书 名 汉代孝子图与孝道观念

著 者 黄婉峰

责任编辑 李肇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7¼ 插页 2 字数 12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469-6

定 价 45.00 元

前 言

孝道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可谓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作为孝道观念的形象刻画，孝子图的广泛传播与巨大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为其他任何国家所未见^①。

据目前所见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孝子图始于汉代，经后世不断增删演变，到宋元时期形成比较固定的二十四孝图。孝子图在中国古代社会曾长期流传，可谓妇孺皆知；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孝子图与孝道观念一起被彻底否定，遭到激烈的批判。而在日渐物质化功利化与思想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从西方到东方，文化寻根成为一种思潮。在中国，人们感叹传统孝道与亲情的日渐缺失，于是有的乡村甚至城市又原封不动地在宣传栏中画上了古代的二十四孝图。结果适得其反，换来的是人们的不理解甚至鄙夷。因为中国古代聚族而居、数世同堂、生死相依的家庭模式早已不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面对的是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与生存的压力，古代社会的谈孝论德在今天似乎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事

^① 孝子图像在汉代已经被绘制于日用器皿上，由中原流传到周边的乐浪郡（今朝鲜平壤附近）等地，汉代以后日本更有与孝子图密切相关的不同版本《孝子传》流传，至今日本学者仍收藏有绘制孝子图的汉代画像镜。

情。孝子图中诸如卧冰求鲤、割股奉亲、孝感天地等荒诞不经的画面，人们自然嗤之以鼻。但孝子图最初的宗旨与主题并非如此，它们主要彰显的是较为朴素的庶民孝养之义，源自亲情，合于人性，是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色，应当得到积极的发掘与继承。

目前，老龄化的社会已经来临，如何应对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少国家都在探讨。一些西方国家也因为难以支付庞大的养老金而注重家庭养老。“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对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是“提倡子女赡养老人”。中国素有孝道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由来已久。但自先秦开始，“不孝”之行便与“孝”同生共存，如一体两面，从汉代开始对“孝”进行大张旗鼓的倡导，对“不孝”实施严厉的惩罚。时至今日，中国国情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而诸多家庭中因赡养老人、遗产继承问题引起的种种尖锐矛盾，除了种种社会原因（如缺乏根本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子女本身生活的巨大压力等）之外，不少年轻人已经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对长辈缺乏亲情、孝心，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心理理念与现代价值是什么？以汉代孝子图为切入点，有助于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追溯孝子图的本源，我们必须从先秦两汉开始。孝子图最初的面貌是什么？其生命力与局限性在哪里？它与主流形态的孝道思想有何异同？它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增添或删除了哪些画面？为什么要增添或删除？孝子图在当代社会还有价值可言吗？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探究。

—

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孝道思想应是对孝道之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证，是一种思想体系。孝道观念则比较零碎、孤立、直观。而从宽泛的意义讲，有关孝道的比较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观念，均可以称为孝道思想。本书正是从后者的意义上去理解，将汉代孝子图所蕴含的孝道观念亦称为孝道思想，它体现的是社会一般思想观念。

关于汉代孝道思想，已有不少论著直接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孔子、孟子视忠与孝为不同的两件事。到秦汉时期，忠与孝的观念才正式混同起来^①。有学者强调，随着汉代封建专制统治的确立和巩固，“孝”逐渐蜕变成为“忠”的附庸，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②。还有学者对北魏葬具与汉画像中孝子图像的异同进行比较，强调汉代孝道思想的核心与基本内涵是“家之孝子，国之忠臣”的观念，汉代孝子图的主导功能是“明劝戒”^③，与上述论著宗旨一致。总之，忠孝合一乃汉代孝道思想的时代特点，似乎成为一种共识。

汉代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历史时期。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先秦是奠基期，秦汉是架构期，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得以确立和巩固，并长期规范着古代乃至近现代的文化发展方向。统治者孝治天下的政治举措（如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对不孝子的法律制裁、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之丧）、《孝经》的空前盛行等等，均开风气之先，为此前所无，是孝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从汉代开始，孝道观念借助于政治力量强有力地推进与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学界往往强调汉代孝道政治化、工具化的一面，正是基于孝道在汉代大一统局面下社会化的特征比较明显。但在必须概括抽象出每个时代的特色时（有时是因建立某种学术体系的需要），容易将某一方面的特征放大延伸，从而产生单向性与绝对化的倾向，对历史观念的复杂性与延续性关注不够，遮蔽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本来面目。况且，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与发展大概并非如今人所归纳的清晰地按照逻辑展开，每一朝代均有鲜明的区别于前代后世的时代特

① 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第30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朱岚：《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前言，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

③ 邹清泉：《北魏孝子图像研究》，第60页、16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色。文化的变化与朝代的更替有时并不同步。对忠孝合一的阐释，对忠孝难两全的典型事例记述，先秦已开其端，汉代更明确而已，古代社会一直存在。更重要的是，忠孝合一或忠孝悖离，从理论上讲，适用于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之下所有阶层所有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对诸侯王与“禄养”父母者即士大夫而言，平民百姓一般不受此困扰。孝养父母与忠于君主是两回事。而对于汉代孝道思想包括对历代孝道思想的探讨，往往是从经典文献中分析归纳而来，对庶民百姓这个最底层而又最庞大的群体关注不够。思想史应当是全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融会贯通的历史。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常识与观念，有的由文人归纳提炼出来，影响世风乃至朝政；有的则一直以民间话语的形式流传，成为流动的思想史。后者可能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它们积淀深厚，传播广泛，是滋生与培育所有精英文化的土壤。

汉代是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的开端，所以孝道的政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汉代孝道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学者指出，在注重变化的同时不应当忽略其中的不变，“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如尊老尚齿的伦理“便是两千年中国农村一层重要的底色”^①。葛兆光先生近年来提出要注重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之研究，强调那是“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②。无论是前者所谓“底色”，还是后者所谓“文化底色”，都是指最基础最根本、具有普适意义的常识或思想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孝始终是家庭伦理道德的基石，也是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永不褪变的底色。《诗经》中被誉为“千古孝思之作”的《蓼莪》篇，先秦儒家的朴素孝论，汉代士人所倡导孝道中的朴

① 邢义田：《画为心声》序言，中华书局，2011年。

②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素孝养，都代表着孝道的核心与本质。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百姓对父母的日常孝养，朴素自然，是这种“底色”的基本内容。汉代孝子图彰显的正是庶民孝养之义。

二

思想史“过去主要只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①，目前则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进入思想史研究者的视野。图像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文化系统可归为文字与图像两大类。文字和文章是文人施展才能的地方，图像的制作者和欣赏层面则要广泛得多。尤其是在古代社会早期，文人画出现以前，图像往往出自民间画匠、工匠之手，绘制于建筑或日常所用的器物之上，使之兼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时代愈早，图像愈质朴率真，粉饰的成分愈少。而图像的直觉呈现，更接近于人类心理的“原发过程”^②。但图与文两者，历来的研究者多是重文字而轻图像。以孝子图像而言，在古代孝道思想史或艺术史的研究中，孝子图像均未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思想史的研究重在对常规文本的分析，从中归纳观念、提炼思想顺理成章，孝子图零碎而不成系统，难以清晰地呈现思想观念；艺术史的研究重在形象性与形式美，孝子图像以人物为主，较之同期其他生动飞扬的画面（比如汉画像中标志性的羽人祥云仙禽图案）显然是呆滞单调的，难入美术家的法眼。然而纵观先秦两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孝道思想发展史，即会发现汉画像中孝子图的独特思想意义，那是在《礼记》《孝经》等儒家典籍以及史书、子书中所难以表述的生动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平民孝道观念，感人至深。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孝子图主要留存在汉代的画像石以及壁画中。汉画像一般指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帛

①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 （美）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第11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画、器物画等等^①。画像石因其天然坚固的石质与丧葬建筑构件的原因，得以大量保存下来，成为汉画像的主体部分。汉画像中刻画的孝子孝行大多不见于当时的经传与史书，因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汉画像孝子图中以单幅画面出现者不多，基本由三五幅以上画面组合而成，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山东嘉祥武梁祠中的孝子图更是有十六七幅之多，是孝子系列图。这个孝子系列图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图像系统，在不同地域、不同载体曾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反复出现，但在汉代的文献中却没有相应的系统记载，所以它们本身便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可以起到证史或补史的作用。

在有关汉代孝子图的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先有孝子传，还是先有孝子图？换言之，孝子图是孝子传的图像化呢，还是孝子传是孝子图的文字化？日本学者黑田彰先生对中国古代孝子传与孝子图有深入的探讨，从他对《孝子传图研究》一书的命名即可见其观点。黑田彰先生在书中多次强调，汉代孝子传早已失传，汉代孝子图是孝子传的图像化。确实，除了极少数图文并茂、榜题完整的图像外，没有文献，我们很难解读汉代孝子图的内容。但孝子图是否必须以孝子传为蓝本、为出典，孝子图一定是孝子传的图像化？孝子传有无可能是孝子图的文字化？孝子图与孝子传两者之间是如何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均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从汉画像中孝子图的质朴性、系列性以及当时文献记载的阙如来看，倒有可能是孝子图在先，而有关的孝子传在后，即后世有关董永、丁兰、老莱子等人的孝子传有可能是汉代孝子图的文字化。因为孝子图内容质朴简洁，生活气息浓厚，极少孝感色彩；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编成的多种《孝子传》则情节丰富，具有强烈的孝感色彩。由汉画像孝子图的质朴推论此前必有孝子传的存在，孝子图必定是据

^① 陈江风：《汉画与民俗》，第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文作画，似难以成立。汉代制度比较疏阔，未颁发统一的孝子图稿，民间画匠亦不可能按照孝子传作图，他们的素材或来自史书（如曾母投杼）与宫廷壁画（如金日磾母子），而更多则来自社会生活，采自民间传说与身边的故事，此过程中可能有民间知识人参与编辑。孝子图来源广泛，不必以某种《孝子传》为准；其基调是生活化、世俗化，而非政治化、神秘化。

别林斯基曾说，“形象大于思想”。图像的丰富内涵为文字所难以涵盖。由汉画像孝子图可以解读出多方面的信息。

其一，突出庶民孝养之义。汉朝对民间并无严格的丧葬制度规定，作为民间艺术的汉画像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吻合，有疏离。汉画像中孝子图彰显的庶民孝养之义，是推行孝道的最广阔坚实的根基。

民间生活丰富多彩，行孝方式因人因家庭条件不同而各异，孝子图便是对民间孝子孝行的生动刻画，体现的是民间的孝子观。它与官方和文人的孝道观念有同有异。

具体而言，一是与官方表彰的孝子不同。据目前所见资料，汉代孝子图绝大多数出于东汉。将之与官方绘画以及《东观汉记》《后汉书》中记载的孝子孝行相比较，可知后者所记孝子孝行主要是两汉之际战乱中舍己奉亲、东汉初年被朝廷褒奖或地方郡县举荐和礼遇者；或者是因亲人去世而哀毁过礼者^①。换言之，他们是特殊时期或特殊类型的典型人物，而不是普通百姓的日常孝行。他们大多因孝行而成为当时国家或地方的知名人士，否则，他们难以进入史官的视野。而这些以孝“受禄致礼”的孝子，最初可能是淳朴的自然的行为，发自真心，在此后的“成名”过程中却极有可能产生变化，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政治序列中的宣传品，距离其真实的生活状态比较远了。汉画像中孝子图的主角则不同。除曾子、闵子骞、老莱子

^① 如见于汉代史书中被官方图画形象的陈纪、叔先雄，被立碑颂扬的曹娥，均为亲人去世后表现的哀毁过礼等孝行，尤其叔先雄、曹娥之例，突出的是孝感以及官方的褒奖。

是先秦以来典籍所载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外，孝子图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名不见经传的汉代平民百姓，而曾子、闵子骞在汉代也被视为布衣之孝的代表。由此反映出官方与民间对于孝道之出发点与视角不同，选材角度也不同。前者重政治宣传效应，重特立独行者；后者重生活本身，重日常孝行。二是与《孝经》的异同。孝子图出于民间画匠工匠之手，《孝经》出自文人之笔。从通俗程度来看，孝子图与《孝经》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仅就庶人之孝这层意义来讲，汉代孝子图的主题与《孝经》中庶人之孝可谓珠联璧合。前者是后者艺术化、形象化的表达，后者是前者的理论诠释。但孝子图并非《孝经》的图解。《孝经》言约意丰，全面系统地论述孝道，将全社会各阶层均囊括其中，铺天盖地皆为孝义；孝子图则突出的是庶民孝行。《孝经》将孝亲与忠君思想合为一体，体现了孝的政治性与功利性；而孝子图突出庶民孝养，孝感亦以此为前提，体现了孝的伦理性与自然性。三是与刘向《孝子图》之异同。西汉刘向的所谓《孝子图》与《孝子传》，常被人们当然地引以为汉代史料使用。其实它见于汉代以后的文人所论所辑，与现存的汉代孝子图对照多不相符，这种情况至少说明汉代有不同的孝子故事在流传，文人所重视的孝子与百姓所喜欢的孝子标准不同。将董永事亲等图画与充溢孝感色彩的所谓刘向《孝子图》以及后世记载相比较，我们当然更相信孝子图，因为它确切无疑地反映了东汉民间的孝子观。

其二，折射出孝道观念的丰富性与层次性。孝道有多层次的内容，不同身份的人行孝内容亦有不同。《孝经》对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五种角色行孝的要求不同，规定前四种身份的人分别以长有天下、保社稷、守宗庙、保禄位与守祭祀为标准尽其孝道，庶人是最普通的民众，他们无天下国家与官禄可守，尽力劳作养活双亲即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养活父母，是孝道最基本的要求，是孝道的底线。汉画像孝子图突出的即是庶人之孝，而不是高不可及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孝，或往往被作为道德

楷模的士人之孝。庶民之孝是在平常生活中的孝敬父母，养老送终，不是为了做忠臣，孝子与忠臣没有必然的联系。通常所强调的汉代忠孝合一之孝道思想特点，主要从统治者的倡导与文人的政论中归纳而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强调“父者，子之天也”^①，“子受命于父”^②。《白虎通义》提出：“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③“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④同一个“孝”字，统治者看到的是移孝为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导民以孝而天下顺；文人强调的是礼禁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故化民成俗，培育孝心最为根本；平民百姓则单纯朴素得多，尽其能力养活父母，让他们颐养天年即可。

孝子图与主流形态的孝道思想可谓同根共生，同源异流。同根共生，言其共同植根于血缘家族社会的深壤厚土。同源异流，则是说忠孝本两途，统治者为使各阶层效忠皇室而大言孝道，百姓言孝则单纯自然，不必入忠君一途。民众思想信仰的源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不是海市蜃楼，不用故弄玄虚。

对汉画像孝子图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孝道思想的丰富内涵。

其三，彰示孝道的原始意蕴与本质属性。在汉代能够入画并流传开来的必定是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宫廷、郡县官府、学校的壁画主要以帝王将相、忠臣等图像为主，汉画像中的孝子形象应是当时民间社会所认可的孝子典型。其中的主要人物、场景及其形象特征（如董永事父中的董永父子与独轮车，原穀救祖故事中的原穀祖孙三代与舆，曾参母子中的织机，闵子骞故事中的车马人物组合），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孝子图中的施孝对象一

① 《春秋繁露·顺命》。

② 《春秋繁露·顺命》。

③ 《白虎通义·五行》。

④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般是年老体衰的父母，孝养重在对在世父母的“生养”而不是去世后的“死祭”。父母是被供养的老者，儿子的孝行不是通常所谓听命于父母的孝，而是日常生活的奉养，包括物质供养与精神赡养，比较朴素。老莱子、邢渠、董永、伯榆、魏汤、闵子骞，均是在侍奉父母生活或欢愉其心。

孝子图彰示的这种庶民孝养之义，实际上是从孔子、孟子到西汉盐铁会议上召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贤良文学，至东汉的王符，儒生们所一直倡导的孝道要义，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徐复观先生曾把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与《孝经》宣扬的孝治思想区别开来，指出孔孟言孝总是归结到人们内心的德性要求，是从德性上来说的；《孝经》言孝则是与忠结合在一起，将事亲与事君相混同，孝道成为君主专制的附庸，此为孝道演变过程的最大流弊。故孔孟孝道应成为重建现代孝道的思想根源^①。此说自然有其道理，但很难突破儒家心性说等精英文化的藩篱。这种所谓“内心的德性要求”，主要是由士大夫阶层阐释并践行。而单纯质朴的庶民百姓之孝，面向实际生活，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儒学，更应当成为构建当代孝道的重要思想资源。

正如有学者从秦汉之际的上书、诏令、官员习惯用语中去研究当时的皇权思想，从而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一样，从汉代孝子图这个特殊的角度研究汉代孝道思想，亦可以认识汉代社会一般孝道观念的内容及其实质，为构筑多层面的较为系统的汉代思想史做出积极的探索。

三

汉代孝子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性与经典性。

这里所谓民族性，是指汉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的孝义精神。汉代

^①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68页，学生书局，1974年。

是汉民族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汉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基本性格在此期孕育定形，体现出原汁原味的汉文化特色。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虽多有磨合，但基本以长城为限。西汉前期，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信中称：长城以北为引弓之国，为单于统领；长城以南为冠带之室，归汉室统治^①。它反映了汉朝君臣上下普遍的看法。西方的佛教虽已在东汉传入京师洛阳，但其教义尚未在思想层面对中国文化造成重大影响。汉代文化相对纯净，表现出汉文化的一种原生状态^②。

所谓经典性，则是指孝子图所彰示的比较朴素的孝道精神。作为早期的孝子图像，汉代孝子图无论在绘画形式还是绘画内容方面，均体现出庶民孝养的质朴特色。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中曾提倡“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笔意。对于朴素感情的表达，越简洁越能突出主题，揭示本质。汉代孝子图近乎此类“白描”。它可能具有多重意义^③，而昭示子孙孝心无疑是最根本的意义。它刻画出汉民族内心深处纯真的东西，那便是基于血缘亲情基础的孝养，是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感情。而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孝养、孝敬之平易朴素的孝道精神与孝感的神秘性均被传承阐释，始创者与传播者，统治者与民众，各类角色各种目的互动互融，孝感之类神秘盲从的内容在统治者的倡导下走向迷人心智的极端。汉代之后，墓葬中孝子图出现比较集中的是北魏与宋金时期。北魏葬具中的孝子图已具有浓厚的孝感色彩，宋金墓葬的孝

① 《汉书·匈奴传》。

② 顾森先生在《秦汉绘画史》一书的序言中说，秦汉是佛教尚未对华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时期，“因此，秦汉文化相对纯净，表现出华夏文化的一种原生状态”。此处借顾先生之言而略加引申。秦汉文化常常联称，但汉代文化成就显然远比秦朝文化为厚重博大，因为它有足够的时间去铺陈演绎。若从汉民族形成的角度言，说先秦是华夏文化的原生状态，两汉的四百余年是汉文化的原生状态，可能更贴切一些。

③ 如赵超先生《关于汉代的几种古孝子图画》一文中，认为：“孝子故事一直用于人们墓葬中的艺术装饰，除了大力宣扬孝道，彰显墓主及其子孙的孝顺品德以外，可能还具有辟除邪恶的宗教意义。”

子图更表现出割股奉亲的宗教性痴迷。从汉代到清代，孝子图的数量由少到多，孝子队伍越来越庞大，孝子故事中的情节越来越丰富，甚至越来越荒谬离奇。其中种种“孝感”的荒诞不经，不近人情的愚孝，足以表现中国古代孝道的负面作用。而变化中仍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内容。

凡起点性、开端性的文化，大多具有混沌未分的特点。在后世不同的环境中，它们会演变、抽绎出不同的内容和文化体系，但其基因、特色不会产生根本的变化。如果面目全非，它就不是原来的文化了。伯榆伤亲、老莱子娱亲、丁兰刻木、闵子骞事亲等题材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董永事亲的故事，在汉代孝子图中刻画的是董永耕作以养活父亲，后世却演变成董永卖身葬父，感动仙女下凡，成为一个爱情故事，但前提仍是孝亲。是因为孝亲感动了上天。没有这个前提，一切无从谈起。

文化寻根是为寻找人性的本真，塑造完美人格。归真反璞，回到原点，汉画像孝子图彰示的孝道观念，质朴无华，却行之久远。

当然，原生态并非完美状态。自汉代统治者开始明确倡导的孝文化，其本质是驯服民众的一种政治文化。汉代孝子图刻画的是对父母的单一孝养与服从，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之双向关系在这里表现的是“子孝”这一单向的关系。而由孝养父母衍生出无条件的意志上的顺从，实质上是小农经济父家长制自然而然的反映。当然，这也与孝子图所在的场所与功能密不可分，墓地环境中的孝子图必须彰示孝子之心。

中国古代有关孝的规范很多，归纳起来无非是养、敬、谏、顺等方面。通常所谓的“孝顺”也可以笼统囊括上述内容。而对父母物质上的供养与精神上的孝敬无疑是孝道的基石与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孝文化的精华。

西方有智者言，“文字对文人能起什么作用，图画对文盲就能起什么作用”。汉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汉代基本定型，孝文化是它不可磨

灭的胎记，孝子图是其鲜活生动的性格写真，可谓汉民族童年时代的“镜像”。它们典型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以情感人的特色，即借艺术形象去感召人们的心灵而不是以戒律去规范人们的行为。镌刻于祠堂与墓室当中的孝子图尤其如此，它们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与神秘意味，因此也更具普及性与传承性。

孝道在中国具有异常深厚的根基和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是古代的高扬孝道，近现代的批判孝道，还是当代社会在具体语境中的谈孝论德，孝始终是中国人心中最柔软、最易触发真性情的地方，自古至今任何人概莫能外，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特性。百余年来，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应当说，民族性与现代性对于当代中国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失去前者就抽空了民族的根基，没有后者则没有历史的进步。而在世界文化多元碰撞的今天，历史悠久的民族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必须挖掘其合于人性的内容，传承其精华，这样的文化才能继往开来，生生不息。侯外庐先生曾讲过，“凡是动摇了的信仰，到了危机时代，反而被人们所重视”^①。经过多重洗礼，也许中国的孝道观念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关键时期。褪尽政治文化的铅华，回归它本来所属的家庭道德范围，孝道就能发挥任何政治说教也难以奏效之功能。

对于中国目前的家庭关系，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与记者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记者说：东方人原来“家”的概念很强烈，现在却不会处理家的关系了，可能与时代转换有关系。龙应台说：因为家和个人原来的那个秩序全变了，“我们是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们这一代还对自己的父母牵肠挂肚，觉得照顾的责任很重，下一代对我们不会这样了，世界的结构已变”^②。由此推论，以孝养为核心内容的孝道观念亦将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终结吗？那对于中国文化究竟是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② 龙应台访谈录，见《都市快报》2009年6月25日19版。

得还是失呢？也许应当说，世界形势在变，文化格局在变，但基于血缘亲情、富有民族特色和永恒价值的思想不会消失。中国传统文化中合于人性的核心理念，居远若近，历久弥新。作为孝文化精华的孝养、孝敬之义正是如此，因为它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渗透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